

# 发现吴城 探索吴城

——《吴城》报告首发式暨“长江中下游地区早期文明演进”座谈会实录



李政 (中国文物报社)

2005年10月14-15日,由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人民政府、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吴城》报告首发式暨“长江中下游地区早期文明演进”座谈会在南昌举行。会议邀请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江西省博物馆等单位有关专家学者参加。与会专家对吴城报告的出版、吴城遗址的学术意义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文明演进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发言摘录如下。

曹国庆:(江西省文化厅副厅长)

吴城遗址是长江以南最早发现的商代遗址,揭开了南方地区商代考古的新篇章,为寻找史籍记载阙如的中原商王朝以外周邻地区的方国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吴城遗址的发现、发掘和研究,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报告的出版,可谓了几代人的夙愿,也为江西地区商代考古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资料的汇总和研究的平台。首发式一方面体现了吴城遗址在中国青铜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表明,吴城文化的进一步深入探索、相关学术问题和诸多有待破解的学术课题的开启,是又一个新的征程的开始。

吴宜文:(樟树市委副书记)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在这收获的季节,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迎来了《吴城》报告首发式暨“长江中下游地区早期文明演进”座谈会,在此,我谨代表中共樟树市委、樟树市人民政府向与会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和代表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

的感谢!

三十多年来,许多考古专家学者对吴城遗址进行了多层次、全方位的探索和研究,打破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论断。吴城商代遗址的发现被评为“20世纪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一”,是江西考古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是打开研究江南古文化的一把“钥匙”和年代学的“标尺”。《吴城》报告的正式出版,是樟树市文化、文物工作中的一件盛事,得到国家文物局、江西省文化厅和科学出版社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报告吸取了考古界各位专家许多宝贵的意见,凝聚着编写组同志们辛勤的汗水,在此,我谨向所有关心和支持《吴城》报告编著出版的单位和个人致以诚挚的谢意!

吴城遗址这座沉睡数千年的商代中晚期方国都邑故城,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樟树人民为有如此宝贵的文化遗产感到光荣和自豪!樟树境内还拥有距今4500年前的筑卫城和樊城堆文化,拥有2000年辉煌的药文化、道教文化、酒文化,可谓历史悠久,文化发达。长期以来,我们依托吴城文化,促进樟树发展。今后我们将继续遵循国家文物保护有关政策、法律法规,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加强管理,合理利用”的文物工作方针,进一步落实文物工作“五纳入”精神,促进我市文物保护和研究工作再上新台阶。

李伯谦:(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报告凝聚了几代人30多年在吴城遗址辛勤耕耘的心血和成果。

吴城遗址的发现是长江中下游乃至华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的重大突破。吴城文化是我国南方地区首次确认的一支与中原地区商文化基本同时的青铜文化;吴城文化的分期是我国南方地区首次确认的

一个青铜时代考古年代分期标尺;吴城文化所代表的文明是公认的我国南方地区最早的方国文明。随着《吴城 1973-2002 年考古发掘报告》的出版发行,作为吴城遗址发掘的参加者和“吴城文化”的命名倡导者,作为一直关注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考古的一个考古工作者,我希望以此为契机,突出文明演进的主题,展开深入研究,将包括吴城文化所涵盖的赣江——鄱阳湖流域在内的长江中下游及南方地区的考古推进到新的阶段。

新阶段,应该有新课题。我认为,一方面我们仍需扎扎实实的做好基础工作。在最基本的考古学文化的序列与谱系、文化分区、年代框架、印纹陶与原始瓷的发明、青铜冶铸技术的来源、族属与国别、文化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上,已经取得明显成绩,但仍存在某些缺环、空白和薄弱之处,在有些重大问题上还存在争论,未能形成较为一致的认识。这些问题仍需要通过艰苦的野外调查、发掘,对出土标本的认真细致整理和分析测试等工作求得逐步解决;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在基础工作取得的成果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和理论探讨,对诸如文明因素的产生、文明形成的原因、文明的特征、文明演进的模式、文明发展的规律以及分别融入中华一体文明的时间、过程等作出科学的论断。从现在所掌握的材料和研究成果来看,长江中下游及华南地区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并不完全等同于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在长江中下游及华南地区不同区块之间也不尽一致。我们对吴城文化知道的比较多,正如大家所指出的,吴城文化以吴城遗址和新干大墓所表明的那样已进入文明阶段,但吴城文明显然是由于商文明的冲击与介入而出现的,属于次生文明而非原生文明。进入西周时期以后,随着吴城文化的消失,该地区又逐渐衰落下去,直到春秋时期才又随着吴、越的崛起而复兴起来。不难看出,在该地区,文明的出现不是本地因素自然发展的结果,文明的发展也不是一条直线,而是走了一个“之”字形。出现这种情况,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外来因素、本地因素在该地区文明演进过程中分别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商周时期矿冶遗址发现最多的地区,对铜矿资源控制、攫取、分配等角度分析,铜矿的开采和冶炼,对当地文明的产生和中原商周文明的兴盛发挥了怎样的作用?长江中下游与华南地区逐步融入中华一体文明的动因又是如何?在“十一·五”期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即将正式启动,长江中下游地区文明演进研究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应该有

自己的地位,应该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白云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吴城报告的出版是江西考古工作者对中国考古学学科建设和事业发展的一项贡献,也是江西近几年考古事业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吴城遗址的发现揭开了江南地区青铜文化研究的序幕,从不同方面证明了吴城遗址作为一个方国的都邑已进入文明时代,是迄今为止长江中下游地区能用考古资料比较清楚说明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文化。报告资料丰富,文化因素分析方法行之有效。结语部分以科学的态度提出了吴城文化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

吴城遗址发现的铸造青铜器的石范是江南地区发现最早、数量较大的一批,应引起关注。从考古学上如何认识国家文明起源标志的物化因素,其中青铜器的起源是一个重要因素。如何看待吴城遗址青铜冶铸技术问题?整个东亚地区存在两个青铜冶铸技术传统,一个是商周青铜冶铸为代表的陶范铸造技术传统,另一个是周边地区(包括朝鲜、日本列岛)的石范铸造技术传统,这一传统在香港、珠江三角洲、东北亚等地区存在了很长时间,以后逐渐被陶范铸造技术所取代。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吴城文化青铜冶铸技术是从商文化传播过来的,为何没有使用陶范铸造传统;如果不是,青铜石范铸造技术的持有者是谁?与商人有何关系?这就涉及如何理解青铜器起源与国家起源的关系,究竟是青铜冶铸技术的出现推动了国家的产生,还是国家形成之后促进了青铜冶铸技术的形成?商周王朝之外周边地区古代文明如何起源的,是否青铜器的出现是国家产生的一个必然标志,吴城地区丰富的资料对于解决这些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樊昌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江西的考古工作可分为几大块:

1. 万年仙人洞、吊桶环遗址的发现,提出了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的问题,早期种植农业的问题。

2. 商周考古遗址资料比较丰富,可分为三大类:一类是赣北地区德安的商代遗存,是典型的二里岗时期的遗址;第二类是赣西地区吴城遗址,规模大,商文化的因素浓厚,具有地方特色。新干大洋洲大墓的发现,更加充实了这类遗址的文化内涵;第三类是

赣东北地区角山窑址。

3. 陶瓷考古是江西的特色,近几年以湖田窑的抢救发掘为主。2002年开始对景德镇御窑的主动性发掘,评为2003年度的十大考古发现。2005年在紧邻浙江的玉山县,配合浙赣铁路电气化工程发现了读口窑,出土二千多件器物,时代为晚唐至北宋,属于浙江越窑系列。今年与故宫博物院、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合作,首次对景德镇市丽阳民窑进行发掘,发现了一座元代的龙窑,尤为难得的是整个装烧情况保存完好,匣钵和坯料完全保留下来,从中可获得装烧技术工艺的资料。另外一座明早期的葫芦窑,揭示葫芦形窑自身形制展示的变化过程,也可以印证《天工开物》对葫芦形窑窑炉形制的记载,其科学价值尤为重要。

4. 配合基建的抢救性发掘,亦取得较大收获,如李渡酒坊的发掘,被评为2002年十大考古新发现。

江西考古今后的工作重点和有待解决的问题:

1. 江西早期文化的发展序列问题,早期遗址发现也不少,但无法从时间、顺序上连接起来。自旧石器时代晚期经中石器时代再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有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但自此之后至距今6000年左右的新余拾年山第一期文化之间尚有数千年的缺环。

2. 旧石器时代考古,目前在新余和南昌安义发现一些旧石器遗存、万年仙人洞下层有一些遗迹、遗物外,旧石器的遗址发现较少,古人类化石更未发现。

3. 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几乎遍及于赣境的东南西北,如修水山背文化、筑卫城—樊城堆文化、社山头文化等。但在距今4000年左右时,虽然在筑卫城中层、高安下陈、广丰社山头三期有所谓新石器时代末期实际是相当于中原夏时期的堆积和少量类似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的陶器遗物,但终未发现这一时期的典型遗址。夏代考古的线索很少,是一个空白点。

江西考古的任务非常繁重,相信在我们不断努力下,在各位专家和兄弟省的共同支持下,尽力解决上述学术问题。目前,湖田窑、洪州窑、万年仙人洞的报告正在整理编辑中,明年将陆续出版。同时,为进一步研究赣鄱流域青铜文明演进过程,我们拟对以吴城文化为中心开展本地区青铜文化发展进程研究,为理解和解释江西地区的青铜文明和早期国家状况并进而将考古学研究引入历史学研究作一定的探索。

张敏:(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几何印纹陶的分布区,从宏观上将这一地区作为一个版块整体考虑来研究早期文明,立意很好,便于大家高屋建瓴地看问题。吴城文化因素分为中原商文化因素和本地因素两大块。吴城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同时期遗址中,文明要素最为全面。古越族按照文献记载,越人有一个从东向西的迁徙过程,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最后形成百越集团,鸟、蛇纹装饰是共性。这一区域同时期多个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值得去研究。

宋健:(上海博物馆考古部主任、研究员)

吴城报告从材料、图版、编排体例到出版质量都非常好。我最早接触吴城文化是从李伯谦先生《试论吴城文化》一文开始的。之后对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一重要的青铜文化也有所关注。江西的考古同行经过努力,付出心血将30年来吴城发掘的重要资料公布出来,以利于更多的学者利用和研究,这是一项非常大的成就。限于材料和考古工作的进展,对吴城文化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报告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应是今后工作中需要思考和解决的。

首先是吴城文化的谱系问题,它的来源和去向。作为一个较早成熟的早期文明,吴城文化究竟是如何兴起的?其自身的文化因素和外来的商文化因素之间是何种关系?究竟是本地土生土长的因素先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还是反之?对早期文明的探索应解决原生和次生的问题。

其次,文明起源是近年热门的研究课题,许多工作都贯穿于其中。近几年文明起源预研究作了许多工作,一是围绕课题开展了许多田野工作,获得了新资料;二是先后召开了系列学术研讨会,如02年在上海开的长江下游地区的,03年在武汉开的长江中游地区的等等,各地交流了新材料和想法,对打开思路非常有益。目前,在早期文明起源的研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距今5000~4000年间,早期文明是如何开始的,一些理论问题还须解决。掌握田野资料和一线人员与理论研究的结合问题有待解决。第二个是年代学问题,各地在注重时空框架和文化谱系研究的同时,对年代学的重视和研究尚有欠缺。就长江下游地区而言,良渚文化的具体年代还有许多不同的意见。

另外,各地区在早期文明的演进过程中的路径

也有所不同。长江下游地区的早期文明并没有继续向下发展,进入青铜文明,反而走向衰落。对这些非中心地区的文明演进的研究中,要注意其文明演进过程中走向衰落的原因,从环境、聚落形态等多个方面考虑。

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教授)

多年前,新干大洋洲大墓报告出版时,我曾写过一篇述评。

新干的报告存在一些不足,图片的质量不太高。吴城报告的质量要好得多。当然有些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思考。比如:城壕中的堆积物,最下一层不一定与建城年代相当,应该是接近废弃的年代。大洋洲是属于吴城还是牛城?吴城的衰弱是否与商周交替有关等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彭明瀚:(江西省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吴城遗址是长江以南地区发现最早且最为重要的文化遗址,吴城文化是商代长江中下游地区最为重要的考古学文化,是当时这一区域内一个重要的文明中心,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湖南省岳阳铜鼓山、费家河商代遗址的发掘,安徽省含山大城墩商代遗址的发掘,四川省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以及江西瑞昌商周矿冶遗址、新干大洋洲商代遗存等重大考古发现,使商代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拓展到整个长江流域。这些发现,扩大了研究范围,丰富了研究内容,学术界才逐渐用“文明多中心”的理论来释读长江流域的商式器物,才把长江流域作为商时期又一个文明中心。近年来,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已成为一个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关注的研究课题,吴城文化是长江中游地区首次命名的考古学文化,也是商时期长江以南唯一的文明中心,因而吴城文化研究还可以深化整个长江中游地区商时期青铜文化的区、系、类型研究,对中国青铜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应当把吴城文化放到长江流域古代文明进程中去审视它,研究吴城文化与当时周边各区系文化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影响,在这样一个大的时空范围内归纳和认识吴城文化的基本特点及其源流。另外再想谈谈新干大洋洲遗存的时代问题。关于该遗存的年代,目前有多种说法,学术界根据对大洋洲铜器群的研究,将其时代定格在二里岗至春秋时期,前后相差约一千年,因此,我们认为,推定该遗存的年代,取决

于对该遗存出土陶器群的研究。大洋洲陶器群,发掘报告推定为吴城遗址二期。我个人认为,从该遗存的主要陶器瘪裆鬲、深腹盆、真腹豆、小口折肩罐、小口折肩瓮、大口折肩尊等的形制变化来看,与吴城遗址第三期的同类器相近。碳十四测年数据也支持大洋洲器物群属于吴城三期。

陈元甫:(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副所长、研究员)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吴城》报告出版之际,邀请邻省的一些兄弟单位聚首南昌,举办一次“长江中下游地区早期文明演进”座谈会,共同研讨长江中下游地区早期文明演进这一为大家关心的课题。座谈会上,大家结合吴城遗址的研究成果,对如何进一步开展长江中下游地区早期文明演进课题研究提出一些方向和思路,使大家相互受到启发,有利于今后更好更有目的地开展工作。我认为这种形式很好,很有意义,值得提倡。

大量的考古资料早已表明,长江中下游地区在整个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整个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长江中下游地区早期文明演进的过程,探索长江中下游地区早期文明演进的规律与特点,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但是,文明化的进程往往是曲折的,它是由自然、经济、民族与社会关系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由于这一地区人类生存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所存在的一些差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民族和社会关系又各不相同,于是,各地的早期文明演进就会有不同的进程、不同的特点、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不同的发展序列。因此,要研究长江中下游地区早期文明演进的总体情况,首先就必须着力搞清各个地区自身的青铜文化面貌、青铜文化序列,建立各地区自身的青铜文化考古学编年,研究考察本地区早期文明产生和演进的时间、特点与模式,以及它与周围地区文明演进的相互关系。只有把这些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做好做扎实了,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早期文明演进的历史面貌,才有可能会比较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吴城文化是长江以南第一个被确认的青铜文化,依据发掘资料作出的吴城文化的分期是长江流域最早确立的青铜文化分期标尺。吴城文化一系列的重大发现,表明了它是长江中游地区一个辉煌的早期文明中心。但是它是否系长江中下游地区最早的文明中心?这个中心后来的去向在哪里?它对下游地区的早期文明产生与演进产生过何种程度的影

响?——这些都是进一步研究吴城文化,深入探索长江中下游地区早期文明演进中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良渚文化是长江下游地区最早出现文明曙光的考古学文化,此后的马桥文化、点将台文化和湖熟文化则是区系类型理论中古吴越文化这一暂时性代词的考古学文化实体。它们与吴越建国在年代学上还存在着一段不短的距离。就已知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来说,还很难将它们和吴越建国联系起来,它所呈现的文化态势更无法与原先的良渚文化或与其年代大体同时之夏商文化相比拟,既没有出现大型的或者成规模的居址、墓葬等聚落遗迹,也没有高规格的遗物发现。种种考古迹象表明,夏商时期是长江下游地区文明演进的蛰伏期。至两周时期,以吴、越王国的相继建立为标志,长江下游地区的国家文明社会才最终形成。因此,长江下游地区的文明演进过程显得尤为曲折与艰难。长江下游太湖地区良渚文化最早的文明曙光最终闪向哪里?良渚文化是否是马桥文化的直接来源?马桥文化与越国的建立有否直接的关系?长江下游地区形成文明化演进曲折性的原因在哪里?目前这些重大的学术问题都还显得不够明了,都有待于大量的考古工作。只有随着这一时段考古工作的深入,具有越建国早期地方特性的物质遗存必将日益丰富,据此上溯其源流,或许也是探索长江下游地区文明起源及其演进历程的一条途径。

杨立新:(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吴城的发掘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报告终于面世,值得庆贺。吴城报告的出版,资料的公布,对江南地区青铜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江西考古商周时期较为重要的发现,如新干大墓、吴城遗址、瑞昌铜岭,为长江中下游地区文明起源和演进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就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明演进来说,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1. 进入历史时期,这一地区主要是百越和南夷,考古学文化主要有长江下游的马桥文化、江西是吴城文化,包括两湖地区的青铜文化等,都是含有本地文化因素和中原文化因素两部分。夏商文化主要通过江淮地区向南传播,这种影响究竟对本地文化起到多大的作用?对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应探讨本地文化的起源问题。白云翔所长提到的铸造铜器的石范的问题,石范在长江中下游、江淮一带都有发现,从青铜铸造的角度看,有传统的因

素,也有就地取材的因素。石范一般铸造简单、小件的器物,青铜容器一般采用泥范,但在一些地区也发现简单的兵器用泥范铸造的。如何看待这些现象还需入思考。

2. 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大量的铜矿,在湖北、安徽、江西都有,是一个大的铜矿带。目前发现最早的相当于商代中期,能否更早?如此大的铜矿带,铜的产量是支持青铜文明的物质保障。是本地人开采,还是中原人来开采,其采矿技术、青铜铸造技术究竟是本地发展起来的,还是受到南方的影响值得认真研究。

3. 土墩墓现象是古越族的葬俗,就安徽来看,这一现象最西可到九华山地区,那么最西能到何处?

长江中下游地区从历史的发展进程看,各地区发展进程不平衡。希望今后各省之间经常加强学术交流,共同推进这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研究。

向桃初:(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我主要谈谈个人对吴城文化研究思考的几个问题:

1. 吴城作为一个方国,对其文化面貌的认识已基本清楚,下一步的研究应深入到与商文化的政治关系问题。通常的研究思路是从文化面貌向政治关系推导,而实际的过程应该是由于某种政治关系的影响反映到文化面貌上表现出一定的特征。因此,吴城文化与商文化或商王朝政治关系的探讨可以为商时期其它考古学文化性质问题的研究提供借鉴。

2. 吴城文化陶器中的鬲,裆部与周鬲相近,这种鬲在长江流域没有源头,又与商鬲完全不同,那么是否可以考虑吴城文化与周文化(先周文化)或许有某种联系呢?南方地区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性质的关联问题由于年代的不确定性和这个时期中原文化对本地的影响等原因往往会异常复杂。如二里头文化的鬲,在长江中游地区一直存在到西周早期。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3. 关于南方青铜铸造铸范的问题。目前南方地区没有发现陶范而见大量石范,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石范所铸造的产品都是武器工具类铜器。铸造武器工具类铜器,石范当然更合适。不过,新干大洋洲的青铜容器应是陶范铸造的。这就提出了两种可能:如果肯定这批青铜器是本地铸造的,那么南方地区也应该存在陶范,可能是因为南方土质较粘,不利于脱范保存而没有发现。另一种可能就是这些铜器不是南方本地铸造的。看来,现在考古发现的仅是一些

表面的现象,南方地区是否存在一个不同于中原的  
石范铸造传统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4. 长江中游地区商周时期文化区域特征鲜明,区域间区别较大,其发展演变的主因不是本地文化自身内部结构的调整而是外来文化的传播与影响。南方地区青铜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毫无疑问是受中原文化影响产生的。青铜的冶炼与铸造并不是一回事,铸造技术一定是从中原传播来的,也许采矿也是从中原派人到当地指导进行的。因此,对于南方地区青铜文明的成就和地位问题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既不能抹杀和低估南方地区青铜文明的成就,也要防止矫枉过正。比如湖南宁乡地区因为出土了大量商代晚期青铜器一直被认为是商代晚期的地方青铜铸造和青铜文明中心,最近发现的应该与这些青铜器有关的炭河里城址的年代却是西周时期。这个发现无疑对中原以外地区出土商周铜器的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

李永迪(台湾中研院史语所)

我作为接受西方考古学训练的考古工作者,对考古学文化现象的研究更注重动态的解释。在南方文明的课题中,我希望能对国家社会做更深入动态的解释,来探讨南方和北方的关系。比如国家理论:国家如何控制社会经济资源,如何分配和控制奢侈品?在考古学上如何表现?吴城报告后面附录了许多检测报告,是个非常好的开始,但仍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很好的阐释这些资料。

冯少龙(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吴城与长江沿江地区的器物不一样,如阳新的豆是方形镂孔,没有长颈鬲,与吴城不同,可能中游地区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带,与采铜有关。

(注:本文除李伯谦、陈元甫、彭明瀚三位先生外,其他发言均据录音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阅。)

(上接第128页)

三. 作者以深厚的六朝考古学识,提出了有关六朝文物的若干新颖见解。

学术研究的最大意义在于创新,作为一本文物专著,作者不仅在资料方面注意最新成果的吸纳,而且在观点方面也力求提出一家之见,如由笔者主持发掘的钟山南朝坛类建筑遗存和梁南平王萧伟墓阙,本书作者对其性质或时代等提出了不同见解,尽管我认为其中不无商榷之处,但作者能从文献和出土材料两个方面,就相关问题开展讨论,这是十分值得提倡的学术创新精神。此外,书中对早年出土的南京大学北园东晋早期大墓主人的辨识;对江苏建湖发现的所谓东晋“东海王墓”性质的重新认定;对南京东郊灵山南朝大墓墓主人的推论;对南京南郊西善桥宫山北麓南朝大墓墓主人的再考;对两广地区东晋时期鸡首壶之时代的纠误;对墓志志盖出现时间之把握等,都是在长期考古实践中对相关材料做反复比较后所得出的结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还有些问题尽管是前人研究的结果,但由于存在不同说法,或研究成果较为分散,作者在书中也尽量择善而从,或加以归纳和总结,如瓦当、墓志、买地券、文字砖、绘画类文物、玉石器、文化交流的见证等章节都有这样

的特点。

在该书“结语”部分,同样表现出作者的学术见解,其总结的六朝文物之装饰由简到繁的趋势、造型的实用和唯美倾向、南北交流的日益频繁、宗教的深刻影响等四个时代特点不仅仅适用于文物领域,也有益于对其他六朝文化现象的分析和认识。

本书之所以具有以上一些特点,我以为,首先是作者的学识之使然。罗宗真先生是南京地区乃至全国研究六朝文物的著名学者,多年来,他与南京大学的蒋赞初先生、熊海堂先生、南京市博物馆的李蔚然先生等诸多专家共同推动了南方六朝文物考古的学术进步,也共同构建了南方六朝文物考古的学术体系,对六朝文物资料可以说是了如指掌;而王志高同志一直在南京市博物馆从事田野考古工作,近年来主持多项六朝考古项目,同时对六朝考古中的若干学术问题也做过深入研究,掌握了许多最新资料。他们两位以各自的特长和学养,保证了本书在六朝文物的历史和当代、整体和局部、深度和广度等各个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也代表着现阶段我国对南方六朝文物整体研究的最新成果。

(责任编辑:许智范)